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六一）·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二九期（zk1806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拒绝遗忘】	风雨长相忆，春晖寸草心——《风雨未名湖》（群序）	王智钧等
【荒唐年代】	告别噩梦，拒绝遗忘——《风雨未名湖》备忘录	卞毓方
【往事非烟】	梦回沙洋（下）	杨立民
【劫后反思】	“启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林贤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拒绝遗忘】

风雨长相忆，春晖寸草心
——《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群序）

• 王智钧等 •

◇ 王智钧（化学系65级）：《风雨未名湖》三首

苍黄天地裂，风雨未名湖。
博雅遗长恨，迷茫赴险途。
大师成鹄的，鱼目扮珍珠。
桃李青春误，稀年叹白驹。

赤子遭魔障，燕园蒙耻羞。
腥风污禹甸，血雨袭红楼。
站队分天地，同窗视寇仇。
三生惊噩梦，岂可再回头。

离散天南北，相逢已白头。
湖边怀故树，塔下忆红楼。
聚啸山林止，盘桓社店休。
九回肠欲语，一笑泯恩仇。

◇ 臧振（历史系63级）：

半世纪前中华大地发生的那场政治运动，是规模空前的一场浩劫。说“浩劫”丝毫不过分。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祸害，给全中国几乎所有家庭带来的痛苦，尤其是给知识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造成的损失，古往今来无与伦比！其严重后果恶劣影响至今还在发酵。

那场运动的发动者选择北大作为发难地，因为这里聚集着由全国各地选拔来的青年才俊。这些年轻人对于政治的敏感，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是走在国人前列的。然而他们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就是缺少政治经验，容易听信煽动、感情用事。政治斗争的复杂残酷，政治家的老谋深算，年轻人哪能吃透？所以容易被利用。

半个世纪过去了，看过了多少风云变幻，这些当年的精英凭着他们的聪明总算明白了许多事情，对于自己当年的举动有了诸多反思。他们迫切希望把自己的阅历感悟告诉自己的儿女，告诉后来的年轻人。这就是《风雨未名湖》编纂者的初衷。

这些当年的一代精英，满怀报国壮志来到未名湖畔，却因遭遇“浩劫”而后凄然离去。为了祖国，为了子孙未来，在等待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用开始颤抖的手，拿起这支沉重的笔，写出当年未名湖畔的腥风血雨，献给母校，献给祖国，献给子孙后代。

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一代精英们那颗不肯泯没的责任心，那颗伟大的责任心！

在这些饱含血和泪的文章面前，一切理论空谈都显得苍白；

在这些年逾古稀的赤子笔下，掩盖历史真相的企图不堪一击！

太史公司马迁说得好：“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这里不必凭空辩论了。希望通过阅读这些过来人的亲身经历，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或许还有望起到“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的作用。

也或许这是奢望，如《诗经·北门》所谓“忧心殷殷”，“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在我们面前，亦如《离骚》所云“日忽忽其将暮”，“路漫漫其修远”。然而母校已经赋予我们一颗不知蜷局的赤子之心，“既莫足与为美政兮”，仍将“上下而求索”。

◇ 张从（技术物理系63级）：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在元大都一间潮湿肮脏的狱房中，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诗中赞扬了春秋时期齐国太史兄弟和晋国史官董狐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秉笔直书史实的事迹，并将齐太史和董狐与历史上的张良、苏武、严颜、诸葛亮、张巡、颜杲卿、祖逖等仁人志士并列，认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每读此诗，都异常感动。

近年来阅读一些“回忆录”，发现常有隐恶溢美，为亲者讳，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给不明真相的读者造成了误导。北大老五届学子，如今都已年过古稀，虽然也曾经历过那个说话写文“假大空”的文革年代，但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必须继承古人秉笔直书的传统，发扬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颂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为当代和后代，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才能弘扬正气，

抵制邪风。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编辑本书的宗旨。

◇ 侯碧辉（技术物理系65级）：

风雨未名湖，云天塔影孤。劫波同渡尽，留鉴记时殊。

大学的时光本该是青年学子发奋学习的岁月，湖光塔影下的风和日丽，朗朗书声，可北大老五届还经历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狂风暴雨。离开学府，被派去“四清”，物理系才女汪静瑜在四川眉山县遇害；而无法躲避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锤击着每个师生的心灵。

这场劫难也是人性的博弈，把人性的两面性彻底展现出来，校园里那么多的师生受到迫害，加害他人的也是校园中为数不少的人，值得人们对人性善恶和社会秩序的反思。有正常的法律约束和良好的道德规范，使每个人能彰显出善良之美，能自己扼制住邪恶之念，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仁爱。

◇ 樊能廷（化学系 63 级）：

每一个从北大文革中走过的人，都是北大历史中的人，北大历史有我们每个人的了一份。直面北大的历史，直面北大的文革史，就是勇敢地直面自己曾经的人生，直面自己的真面目、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份沉重，也是一份不甘尸居余气的救赎。

◇ 郑振卿（历史系 64 级）：

中学时期曾经是个“文学青年”的我，经过北大历史系两年的熏陶，加上年龄的增长，对历史越来越钟情，阅读历史，敬畏历史，记录历史，追求历史的真实，成了最大的爱好之一。

五十年前，我们在文革发难地邂逅文革，亲历了运动开始前两年酝酿阶段及最初三年的高潮时期，恐怕每个校友都尝过酸甜苦辣咸的滋味。对这场祸及整个中华民族甚至流毒海外的浩劫，本来已经做出结论，现在却众说纷纭，谈及北大运动，更是莫衷一是，盖出于对此总结不够，首先是没有给人们留下足够真实的记忆。补上这个缺憾，我想，凡是经历过北大这段历史的校友都有责任。

当然，由于每个校友的经历各异，对文革的记忆一万个校友就会有一万种记忆。那也无关紧要，真实就行。当然，春秋五十载，我们的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经过去伪存真沙里淘金，显露的便是真实的历史。重要的是，要拿起笔，开始真实的记录。

记录历史就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我们做不到像春秋时期齐国的史官太史伯几兄弟和唐朝贞观年间的褚遂良那样，起码要像季羨林老师说过的：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

文革以前，历史学界有一个名词，历史主义，这个曾经惨遭“四人帮”一伙批判的学术概念，我现在还依然认为是真理，那就是，考察历史，一定要放到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那个背景中去。做到这一点，每个校友就会相当超脱，记录历史就不会有任何顾虑。

当校友们读到《风雨未名湖》这本书时，我的这些话，不知道各位以为然否？

◇ 姚莹（历史系 64 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高等院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同时也弥漫着肃杀的气氛。彼时的北大学子，既沐浴了湖光塔影下的和风细雨，又经历

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狂风暴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强烈地冲击着燕园的各个角落和每个人的心灵！北京大学是社教运动的试点，又是文革的发难地和试验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深重。让我们的后代难以想象的是，我们竟然狂热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我们高呼口号，上街游行；批斗“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文攻武卫”……昔日朝夕与共的同窗，竟然因观点不同而反目，势若仇讎。有些校友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遭受批斗、关押、劳改，如王远枝、郭庆山等校友；更有一些年轻的宝贵的生命，被荒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洪流无情吞没，例如物理系才女汪静瑜在四川眉山县“四清”时被害，数力系王建新死于温州武斗；无线电系殷文杰在北大武斗期间被刺死，地质地理系刘玮被打死；中文系才女沈达力、刘平被迫害含冤自杀等等。回忆那个非常年代的经历，心情是沉重的；然而反思历史的教训，又是十分必要的，对全国也具有警示意义。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让悲剧不再重演，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读此文集，不仅能唤起我们对非常年代北大生活的回忆，亦能获取校友深刻反思的启迪，并得到语言文字之美的享受。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不朽的《离骚》，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穷困。”——就是我们人生一直遵循的法则。我们老五届学子承袭了先贤的思想光芒，我们就是爱国忧民、安贫守道的思想者——这是北大人特色，也是北大人风格，更是北大人骄傲！“位卑未敢忘忧国”（宋·陆游）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总是关心时政，安贫守道，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愿我们坚守初心，时刻牢记蔡元培校长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发扬五四“科学、民主”的光荣传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献出我们老五届北大人的余光和余热！

◇ 奚学瑶（中文系64级）：

未名湖的蕴涵太丰富了。她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结构，更重要是一种情感和气质。这里传统与现代同时并存，沉重塔身的前边，照射着科学与民主的太阳，一代又一代学子，像葵藿一样仰望着她，迎着创世纪的曙色，编织着青春鲜丽的燕园之晨。被科学与民主之火沸腾起来的青年学子，怀着赤子之心，像一个个赤身裸体的纤夫，顽强地拽引着理想的航船逆水行进。显而易见，今天的未名湖已与当年大为不同，北大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成了世界性的学府，中外学者往来其间，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汇，一代具有世界目光的青年学者正在崛起。传统文化已趋深化，现代意识正在激扬，与我们当年的北大相比，给人以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北大现代化的历史步伐是不可抗拒的，一枝带露的红杏，总要超越古老的门墙，迎着春色傲然开放。

一场春风吹过，埋藏在地下深处的人性之根萌发了，燕园的春草又绿茵如霞。当人们再回到未名湖边，当年的派敌们，很少再去纠缠那些往事了，相逢一笑，往事如梦。春的烂漫和秋的沉实，形成了历史的年轮。美丽的校园，令人愉悦，而唯有进入过魔界的人，才能在未名湖边感受到仙景的缥缈。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过去了的也不用叹息，还是把美好的祝愿留给当今一代和后来的学子吧。来吧，校友们，不管你经受过1957年的风暴也罢，不管你经受过“文革”的骤雨也罢，让我们都到未名湖畔相聚，让绿琉璃似的湖水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用我们未老的歌喉，去呼唤理想的未来！

◇ 卞毓方（东语系64级）：

这是现代版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老五届校友，都是跳过龙门的鲤鱼，入学之初，都有又红又专的报国梦。文革来了，才知道这梦有多凶险！红，无法界定。你革命，别人比你更革命。你左，别人比你更左。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

是五十步整一百步。今天属于红，明天就可能变成白。而白专就是黑专，白即黑。专，似乎天生属于白，“知识越多越反动”，自然也归于黑。因此，上天入地，倒海翻江，一番折腾，又各有各的西天取经，“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各有各的“煮酒论英雄”或“舌战群儒”或“火烧赤壁”，各有各的“灵官殿”或“梁山泊”，各有各的“红楼梦”（此红楼不是彼红楼，乃燕园前身沙滩红楼的借喻）。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断送了多少潜龙腾渊、乳虎啸谷的大才。文革又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转机，埋葬了“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梦魇。

《风雨未名湖》，这题目出得很大，很辣，倘若易位为《未名湖风雨》，那就未免小家子气，有失北大人的格局。

此生，有幸为北大人。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观北大》）先知者谓之先觉，后知者谓之后觉。红尘看而不破，不看自破。天人从不合一，倒是人天要常和常谐。大材由来不屈，深谷罅缝里照样择阳生长，断裂的知识重新链接，失落理想在新的风雷下迅猛聚集，北大老五届是折而不屈的一代，他们不论散落在何方何处，其实始终没有忘记鹰的使命，只是那搏云的姿态有点独特，仿佛一展翼一拢羽都散发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望而知，是从未名湖上空掠过的，这就是北大人之为北大人。

谁谓历史虚无？

写下，就是在场！

写下，就是拒绝遗忘！

写下，就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写下，就是刀刻斧凿，留下一段活生生的当代史！

◇ 附：

刘兰平（65级图书馆系）：位卑未敢忘忧国（跋）

“文革”是一场浩劫，这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认定的，这个定性也是深孚人心的。“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难以估量。如何深挖“文革”产生的根源，肃清其流毒，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对于国家未来命运至关重要。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一扫“文革”阴霾，坚持改革开放，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人民欢欣鼓舞。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社会上仍时有暗流涌动，沉渣泛起。追捧“文革”，为“文革”翻案的极“左”思潮常见于网页、微信等媒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忧虑。北大是“文革”的始发地，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北大老五届学子都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都有痛心疾首的感受。我们是其过来人和见证人，把我们的真实经历和亲身感受记录下来，作为镜鉴，昭示今人后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出于这种初衷，我们才不辞年迈古稀，开展这项工作。

我们这几个小人物不自量力，全凭一颗赤子之心，自发聚集一起做这件事。不求煌煌赫赫，不求功名利禄，只为保存并抢救学友们的鲜活记忆而尽心竭力。“文革”自发动之日到现在，已经忽忽五十一年过去。我们已从青春少年变成白发翁媪，重任在肩，深感光阴飞驰，时不我待，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今年春天，继《告别未名湖》四卷系列问世之后，我们又发出了《风雨未名湖》的征稿启事，得到了北大老五届校友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来信，来电话鼓励我们。有的校友说：“你们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有的校友甚至说：你们“呕心沥血，废寝忘餐，成就了堪称当代《史记》之大业，全国人民都会感谢你们。”

很多校友秉笔直书，踊跃投稿。并且慷慨解囊，寄来赞助费。我们知道校友对我们的褒奖太过，我们担当不起。但是，他们同样赤诚的心和敢于担当的勇气令我们深深感动，鞭策我们不能畏葸不前，不敢懈怠马虎。

经过大半年辛勤的劳动，以及承受难以言说的苦衷，终于，我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现在该书已经基本成型，即将付梓。

全书共计68位作者，74篇文章。其中有6位作者分别撰写了2篇。作者来自全校17个系。除了地球物理系没有作者撰文以外，其他各系都有文章，尤以技术物理系、数力系、历史系、中文系、东语系文章为多。图书馆学系虽系小人少，也贡献了4篇佳作。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有代表性的，它或多或少地映射出当时各系的情况。全书文章在编辑体例上按作者系属代号排列；同系的按年级高低排列；同年级的则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为序。

我作为该书编委会的联络员，有幸在该书付梓之前就浏览了全部来稿，感觉收获丰饶。这本书中，有的学长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出了真诚的忏悔和道歉；有的回忆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由狂热到冷静的思想转变过程；有的记叙了老师、同学和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和苦难；有的陈述了在校期间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有的控诉了因“出身不好”使自己在青春年华所吞咽的苦涩；有的讲述了北大的伙食和迎新工作，参加文艺演出的难忘记忆；有的叙述了自己在武斗时无处可归的流浪经历；有的痛陈了亲眼目睹受难者因不堪迫害而痛别人世的惨烈情景……总之，同学们的文稿像银幕一幕幕展现，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北大的现实，是认识那个时代鲜活的弥足珍贵的史实。

这些来稿中，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阴霾。但是泪水多于欢笑，阴霾多于阳光。

有些文章，是有激愤之情的，是有锋芒的。然而，如果面对黑暗，没有激愤的呐喊；面对邪恶，没有正义的锋芒；这篇文章还有力量吗？还那么珍贵吗？

有些文章，反映个人爱憎，可能有偏颇之处。但我们还是秉承北大“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光荣传统，将其收录书中，以便求同存异，更全面地反映北大老五届同学的思想现实。是非曲直，留待北大老五届学子和广大读者去判断。

诚然，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不足是反映的内容还缺乏广度，有的文章还缺乏反思的深度。这些不足，希望后续之作能尽量弥补。

本书是北大老五届七十多位同学的心血结晶，是那个特殊时代北大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北大老五届学子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拿起笔来，写出你在校时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写出你的反思和醒悟。为国家和民族，讲真话，做实事，尽匹夫之责，献赤子之忱！

最后，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的各位同仁，向热情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老师与同学们致以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来源：《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

~~~~~

## 【荒唐年代】

### 告别噩梦，拒绝遗忘——《风雨未名湖》备忘录

• 卞毓方 •

（卞毓方按：《风雨未名湖》已出，有幸参与阅稿，随手记下几则荒唐年代荒唐事。）

#### ◇ 知识分子的窝里掐

“我们没有整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说话的，是当年清华军宣队一位成员；转述的，是东语系四六级梁志刚。

现有一例：历史系教授周一良，一九四八年著文《乞活考》，讲西晋末年，塞外胡族南侵，北方的居民纷纷向江南迁徙。其中有批流民从山西出发，走到黄河边上，停止流亡，就地驻扎，安家建园，组织军队，号称“乞活军”，南联故晋司马氏政权，北拒胡族，居然坚守了一百多年。此文刊于《燕京学报》，印数只有寥寥几百，鲜为人知。文革初期，历史系青年教员丁则勤把它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公诸大字报：《周一良的〈乞活考〉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证据是：发表时间，值国民政府崩溃在即，军队仓皇南逃，周一良借古喻今，劝国民党军队相机止步，凭坚乘险，拥兵自保，以待来日。你看，这不是反动透顶又是什么？！（引自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

又有一例：历史系六三级臧振，生性敦悫，跟不上“捕风捉影处处影、无限上纲句句纲”的形势，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落伍，进而升级为反动——此事，他始终蒙在鼓里。直到毕业后若干年，在他乡遇同窗吴泽湘，吴告诉臧：毕业时，我最后离校，行前，工宣队郝师傅交底，班上两位积极分子，愣是揪住我不放，说我是反动分子，企图为彭德怀翻案。还揭发另一个反动分子，就是你臧振，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工宣队查无实据，把他们整的黑材料统统烧了。

臧振听到这儿，禁不住高呼：“郝师傅万岁！”

#### ◇ 美学家的旷世一劫

清扫楼道、洗脸间，这是轻活，却也不轻，因与学生低头不见抬头见，情形尴尬，他就尽量低着头，万一无法回避，就背转身去。

清扫厕所，这是脏活，累活，最麻烦的，是那些劣质的手纸，从书本上扯来，从报刊上撕来，水冲不走，积久成灾，堵塞通道，他就弯下腰，伸出手，没有戴手套的手，把脸贴近大便池，一把一把使劲掏，掏净了，搁入几乎与他等高的大竹篓（他也实在太矮），弓腰背起，蹣跚着送往垃圾场——远远看，就像大竹篓安上了两只脚，只见篓，不见人。

他不是别个，是朱光潜，大牌美学家。

郑克中（俄语系六四级）记述，老人上身穿了一件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下身是一条皱皱巴巴的兰裤，裤脚挽起，旧球鞋，和任何人都不说话，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

是低着头。也是那期间吧，一次，在从宿舍区到教学区的道上，我和老人走对了面，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朱先生”，他吃惊地抬起头，瞬了我一眼，随即眯了眯左右，又迅速瞅了瞅我，没作任何回应，继续低下头，迈着缓慢而又不失从容的细步，走开，走远。

◇ 《评妖传》，你还安好吗？

一本据说是罗贯中编次冯梦龙续写的《评妖传》，被文革的千钧棒打入冷宫——尘封在某工厂图书馆。

管理员整理书架时顺手翻了翻，这一翻居然喜欢上了，觉得蛮好看。

好看的东西要跟朋友分享，私下里，她把书推荐给厂里一位要好的姐妹。

这位女子把书掖回去，正好碰上星期日，在北大读中文的小叔子张杰在家。张杰识货，晓得《评妖传》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晓得归晓得，今日方初见真容，他从嫂子手里接过来，一看就爱不释手。

嫂子见状，大度地说：“你拿去先看，可要保密，不能让其他人发现啊！”

张杰晚上回学校，乘一〇五路无轨电车，因为请别人帮忙办理的月票少盖了一个公章，在终点站，被售票员查获，司机过来协助审问，听说是北大的（那是六九年秋天，北大已成了负面词），立刻搜他的书包，这下，《评妖传》暴露了。

“哇！《评妖传》！什么年月了，你还看这种歪书！”

张杰被押回汽车总站。

“给北大打个电话，查查有没有这个家伙！北大的？我还说我是清华的哩！”

电话打了。中文系工宣队答复有这个同学，平时表现不错，若有什么问题，咱们系里处理。

那位接电话的师傅姓苗，第二天，他从张杰手里接过《评妖传》，翻了翻，掂了掂，一脸苦笑：“我说张杰，你是中文系的，研究的就是这个，看就看吧，带到公共汽车上干什么，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幸亏我了解你，把事情按了下来，要是闹到学校，麻烦就大了！”

稍待又说：“这么着吧，我把书交给你们班的杨排长，到时候你跟老杨去要。”

杨排长是军宣队的。

事后，张杰找杨排长要书，杨排长总是找理由，一拖再拖。



张杰无奈，一天，他硬着头皮闯进杨排长的办公室，恰巧杨排长不在，抽屉敞开着，里面搁的，正是读到一半的《评妖传》。

张杰不敢私取。

心想过几天，等他看完再要。

谁知杨排长突然换岗，回部队了。从此，那本一波三折的《评妖传》，也就随着杨排长的蒸发而蒸发。

◇ 侯母为何栽在特大喜讯？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七十三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这事如果入不了壮举，世界上也就没有几件事可以称得上壮举。

一九六七年，更大的喜讯传出：叶剑英元帅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宣布，根据北京医学专家研究的成果，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

举国沸腾！——世界有没有沸腾，我不知道，那时与境外断绝，如果有谁收听境外广播，是要被作为“偷听敌台”处罪的。

技物系六五级侯碧辉，这个云南来的姑娘，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沸腾着。

她要把这重磅消息告诉在昆明的母亲。

那年头通信，讲究在信封背面抄几段毛主席语录，以示革命者唯有大义，没有私情。侯碧辉更加郑重其事，她把这一特大喜讯抄在信封正面，而把母亲的姓名、地址写在信封背面。

她用的是母亲单位的地址。

信送到单位传达室，首先被觉悟特高的革命群众发现，结果，侯碧辉的妈妈还没有看到信，就先挨了一场批斗。

理由是：“革命群众都说毛主席万寿无疆！你女儿反动透顶，胡说毛主席只能活150岁！”。

不知道是不是昆明地处边疆而又高原，双重的闭塞？还是那儿的革命群众特别特别“沸腾”，理智都已“汽化”？我实在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是一种说不出的妙，这么一说我又明白了，天高皇帝近。

2018年4月

~~~~~

【往事非烟】

梦回沙洋（下）

• 杨立民 •

（上接 z k 1 8 0 5 c）

毛的一生，靠农民运动起家，最后得了天下。从历史角度看，他其实并没有给中国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分给他们的地，很快就又以合作化为名连他们原有的地在内都收了回去。在他的领导下，几千万的中国百姓悲惨丧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但农民的大多数并没有威胁到他的统治，他们仍然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对于他们，愚民政策是有效的。在他看来，对他的威胁最大的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会独立思考，而且喜欢多嘴多舌，搅乱人心，挑战他的权威。所以他要打掉他们的气焰，让他们出丑，让他们闭嘴，让他们失去自尊和自信，让他们成为没有独立意志的螺丝钉。而要做到这点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赶到农村去，让他们去挑大粪，扫厕所；让他们在农民面前因为五谷不分，因为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却不会给猪看病而遭到嘲笑，变得斯文扫地。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农民化。为了做到这点，毛不惜把学校都关门，不惜把不服管教的55万知识界精英打成右派分子，让知识分子永远不敢不服从。到了文革，更把所有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打入另册，连知识本身也都当成罪状，根据知识多少，把知识分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苗子之类。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今天有些年轻人也许以为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实际上当时是人所共知，千真万确的事实。

据李锐说，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曾经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1966年4月24日，他在“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又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西谚有云，在一个全部都是瞎子的国家里，一个独眼龙就是国王。反过来，当一个独眼龙成为国王时，我想他肯定又要千方百计地把他的国民都弄成瞎子，这样才会感到安全。

毛当然是才华出众的，而且具有特别的人格魅力，不然，即便有我国文化中几千年的帝王思想的肥沃土壤，也不会恰恰是他成为那么多人（包括本人在内）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有些人至今仍然如此）顶礼膜拜的红太阳。但是凡是对历史的真相有点了解，并能对事实有起码尊重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教育。他的知识结构是非常残缺不全的。除了古文和古代中国史有些根底，散文和旧体诗词和草书也别出一格（这位自视极高的前领导人确信，他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伟大，因为他比他们有文采，多风骚。）但他并不懂经济学，并不懂社会学，法学基本上是法盲（他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自然科学的常识也十分可怜（不然不会相信亩产能到十二万斤，也不会提什么消灭麻雀的口号），他虽然是搞权术打游击的高手，但实际上并不懂现代政治学和军事学。他对国际关系，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的理解，都没有超出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的水平。他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就是“造反有理”一句话，对辩证法就理解为简单的“一分为二”。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了，是一些人为了造神需要提出来的神话。马克思不会主张一穷二白的国家能马上穷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也不会颠倒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把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看成“皮上的毛”，而把上层建筑的政治家看成“皮”。

知识结构有缺陷并不可怕，一个明智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在于能物色到各种能人，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进一步让全国百姓，上上下下都各得其所，尽其所能。但一个领导人不能轻视教育，蔑视知识分子，摧残知识分子。一个领导人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越要谦卑。不幸的是，毛却以为知识分子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革命，而自己什么都懂，因此全国都必须由他一个人提笔在这个土地上乱涂乱画他能想象出来的“最新最美的图画”。事实证明，不懂种田，不懂做工，不懂革命的正是毛自己。不然，不会按照他“农业八字宪法”搞农业大跃进，弄得几千万人饿死；不会闹出全民后院炼钢这种劳民伤财的古今中外的大笑话；不会发动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粹，连带国家方方面面知识界，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领尖担纲人物，统统都“革”掉了“命”，最后弄到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对这位自称“绿林大学”毕业的前领导人曾经顶礼膜拜过几十年，他的文章，很多我都可以几乎倒背如流。我相信，毛的心里，尤其是在年轻时代，不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要为国为民造福的理想主义。但他的一生，是一个大悲剧。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计的，得到的教训也是无可计量的。当年千百万人走五七道路的经历，必须在这整个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来理解和评介。现在当初的知青战士，今天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头人物。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在豪情满怀地怀念这些“青春燃烧的岁月”，忘记了，当时上山下乡，不是为了参与劳动，学会种田，更不是为了回归自然，休闲浪漫。实际上那些都和发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无关。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五七道路是反教育、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重要步骤，是文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反智主义”的一种表现。每个国家都有“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传统，中国尤其如此，而且多年来被误当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实际上反智主义历来都是专制独裁的衍生物、共同体。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今天我们如再不悔悟，继续蒙在鼓里，自作多情，自欺欺人，那就大祸不远，非常危险。

本来，下到农村走五七道路有一门必修课是向当地的贫下中农学习。可是由于沙洋的情况特殊，这门必修课就只好免了。前面提到，沙洋原本是个大劳改农场，现在劳改犯绝大部分都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少数农民。他们有时会不无骄傲地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们已经是“新人”了。意思是，他们劳改期已满。我当时感觉，换了我，这“新人”的称呼还不如不要。既然劳改已满，不就和普通人一样了吗？叫他们“新人”实际上等于让他们一辈子背上这羞辱的标记，这和前几年叫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是“摘帽右派”，叫地富子女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或古代历史上给犯人脸上刺金印是一个做法。总之，我们在沙洋，基本上和这些“新人”没有来往。这些“新人”生活显然很困难，眼瞎的比例出奇地高，估计和他们土垒的炉灶不通风有关，但是，也没有人过问这些事。倒是我们每次去沙洋镇，领导会反复提醒，见到那些剃光头的人，躲远一点，那些大都是剩下的劳改犯。

最近，人们都在谈论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说到莫言在小说里对于饥饿的回忆。我们70年到72年在沙洋期间，按说那大饥荒年代早已过去，五七干校粮食管饱，但对我们来说，很多记忆仍然和整个前半生一样，和吃有关。说起来，也真没出息。

主要是劳动强度太大，营养不够。沙洋那时是个穷地方，镇中心和附近钟祥县县城里，人都无所事事，没精打采。没有多少店家，店里的共同特点是里面都空空如也，尤其是没有可吃的东西。这就自然供应不起这突然从北京来的一千多张口。不要说供不上鸡鸭鱼肉和蔬菜蛋类，就连咸菜疙瘩也供不上。平时只好派人从北京捎带一点解解馋。记得在沙洋的头一两个月，天天吃冬瓜，一点荤腥都没有，有人就学着沙家浜里郭指导员的唱腔，唱，“那一

天同志们把话拉，一齐抱怨营养差，从早到晚不停手，一日三餐就冬瓜，似这样长期来住下，只怕是，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

后来，干脆连冬瓜也供不上了，改成天天吃本来是用来喂猪的牛皮菜，那东西实在又老又苦，难以下咽。吃了一阵，实在没办法了，人们就开始动那个池塘的脑筋。宣传队领导向地方上借了七八部抽水机，日夜开动，几天后最后终于把那个多年没干枯过的大池塘抽得只有齐腰深了。然后，头头们一声令下，几百个男劳力一齐跳进池塘，来回扑腾，搅得水都成了泥浆，那水里的鱼就都挣扎到水面透气，两眼一抹黑，完全失去逃命能力。我们这叫真正的浑水摸鱼。经过两三小时的奋战，池里的鱼，连带所有其他水生动物，终于遭到全歼。我们捞到的鱼，从大的开始吃，最后吃到很小的杂鱼，算是享用了几天的百鱼宴。但鱼毕竟不经吃。美美吃了几天之后只好又回到原来的清汤寡水。

过了一阵子以后，不知谁回忆起，那个池塘里面好像有一些野藕，挖出来也可吃。领导立刻组织劳力前去。可怜那些藕又细又老，不像我记忆里吃过的藕白白胖胖，肉又厚又嫩。不过，此时此刻，也算是难得的美味了。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找东西吃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第一要务。我们刚到沙洋的头几个月，没有任何假日。后来，总算开恩，每十天有一天专门给大家从事‘红色家务’，意思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一天洗洗衣服，互相理理发，给家里写信汇报汇报自己走五七道路的体会，或留在营房学学老三篇。实际上，大多数人当时最重要的家务——不管算不算红色，是找东西吃。所以，很多人天不亮就悄悄起床，步行三四十里地到镇上或县里找饭馆去了。沙洋镇上基本上没有可吃的东西，当地有民谣，说什么这里“糖不甜，醋不酸，饼干就像耐火砖”。钟祥县城好一点，有一两家小饭馆，听回来的学生说，他们到那里时，发现海军宣传队头头老王已经捷足先登，一个人端坐在那里，一杯黄酒，几碟小菜，正在大快朵颐。那两家饭馆很快给我们的人吃了个底朝天，包括缸里养着的王八和院子里见到的小鸡。迟到的恨不得把老板养的狗、猫和老板本人都吃了。有一天我很运气，也发现了一样鲜美的食品：鲜笋。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废弃多年的无主竹林，留下了稀稀拉拉十几根竹子。我来自浙江多竹的山区，独具慧眼，竟给我找到了几十根鲜笋，虽然每一根也就拇指大小，在老家是没人会吃的，可现在，对于我这个20世纪孤岛上的鲁宾逊，无异天赐仙品。我没有锅，就用一位教师吃空了的家里带来的罐头，没有炉子，就挖个坑用旧报纸和枯枝烧。记得周围有几个女同胞看着我熏得满眼流泪的样子，一齐好奇地过来看我在干什么，但她们一见我那个烧黑了的罐头，说什么也没勇气品尝我里面的东西。说来还是学生们有办法，他们有的每天下地，一面干活，一面见到青蛙就用柳条打个半死，然后一齐埋进土里，以免天热发臭，下班时带回让炊事员帮忙加工。回想起来，幸亏我们在沙洋只呆了两年多，不然沙洋的青蛙就要成为濒危物种了。

说来，群众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有人发现一个重要秘密。这里过去的花生地，收不干净，现在到处都能找到已经结了果的野花生，连树林里都有。用光脚丫子踢踢，沙土里就会滚出花生来。经过仔细搜寻，居然找到不少，炒了炒，足够给每人发两斤带壳花生，作为营养品。可惜数量实在还是太少，不经吃。我基本上一小时胜利结束战斗。但那些老先生们，都舍不得吃，革命意志也特别坚强，能有计划地坚持一天只吃几颗花生。德语系的一位老教授，十分无‘齿’，也顽强地用‘软磨硬顶’的办法，努力每天吞它几颗，给自己加营养。剩下的老先生们都细心用口袋包着，挂在房梁上（我们那时已不再睡草棚了）。有一天，水天同教授痛心地发现，他的口袋被耗子咬破，花生也给偷吃得满地狼藉了。水先生后来怪自己曾经多次骂房间里的耗子，承认自己有得罪它们的地方。说到沙洋的耗子，也的确神通广大，有一次，有一位有病没有出工，他发现这些耗子大白天就成编制地在我们房间作案，居然由一只耗子仰天抱住鸡蛋，然后由几只别的耗子拖着这只耗子回洞，计谋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当中只有一位同事，对沙洋的食品供应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回忆，那就是在沙洋突然得了急性肝炎的老温。为了给他保证营养，早日恢复健康，每天下工回来，总有师生给他带来一些野味。有鱼，有黄鳝，有青蛙，有王八乌龟，甚至还有夜里落水淹死的狗獾。老温天天有荤有素，居然在沙洋养好了病。……该说句公道话，我们在沙洋的第二年，生活条件有明显的提高。自己种的菜，新鲜黄瓜、西红柿、香瓜都陆续可吃。到年底，又因为马上要回北京，只好对所养的猪采取三光政策，就地正法，杀光，烧光，吃光。一时间，像我这样坚持到最后的，都吃得满面红光。不过，这些细节，对我们艰苦的五七战士的光辉形象有损，不说也罢。

在沙洋五七干校的最大亮点是，一段时间内，几乎人人都相当平等。这倒并非谁的恩赐。实际上，我发现，只要没有外力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人们通常都是基本平等的。在沙洋，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男女老少，不管地位高低，不论教师学生，通通一起蹲在地上吃一样的饭，然后穿一样的破衣服在地里肩并肩干一样的干活。人与人没有隐私，没有距离，有时满身泥土，连样子也分不太清。从文革开始以来，人与人不断被划分成保守派、造反派、逍遥派、红卫兵、工农子弟、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干部子弟、烈士子弟、党员、非党员、党外群众（现在也许叫闲杂人员）、革命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苗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二月逆流派、黑帮分子、黑帮爪牙、五一六分子、右派、右摘分子、狗崽子、可教育好的子女、极左派、中间派、中右派……我在学校时，每次会议结束，主持人都会说，现在，请党员同志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有时，要求留下的还有“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当然不属于这些光荣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而属于“其他”这一类。留下来要说的自然是我们不该知道的重要国家大事。我们只好在大家目送下从人群中低头走出会场。那滋味真不太好描写。不过，这些三六九等的等级划分，到这块沙土地上却模糊了。连已经承认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某某也和大家有说有笑，而且因为他会按摩，前来求他的人络绎不绝，也不知道哪位又说他应接不暇，成了红人。有相当一段时间里，那些“牛鬼蛇神”队里的——其中大多数是很有学问的老教师——在劳动时不断会发出笑声，大概是有人说了什么让大家乐不可支的笑话。

可是，这些好日子不长。伟大领袖教导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岂能让我们这样放松这根弦！于是待到我们地里的活稍微轻松一点，马上就开始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有谁，有多少人被审查，以及由哪些可靠人士负责审问，我不知道。但有一天，我们系的讲师吴道生，被发现溜出营房，在一个树林里找了棵树，上吊自尽了。负责料理后事的陈祖芳党性很强，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吴道生以前在万恶的国民党时期当过新闻记者，妻子因为和他结婚，团内挨了批评，吴反右时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抱怨领导不该“恨屋及乌”，结果划成右派。这句话什么意思，开始时我还不明白，以为是吴不小心把“鸟”写成“乌”了，后来查了辞典才弄懂。我对他并不了解，只听说此人很聪明，英文水平很高，是个不错的教师。好像他还有两个儿子，老婆在他成了右派以后就和他离了婚。不知道这么多年他都过来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自绝于人民。吴的自缢非常出人意料，因为他受到的冲击远不及其他很多教师。也许他所受的折磨，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吴道生当了右派以后，一向独来独往，没有一个朋友。他的死，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人再提起。不过下面的事情牵涉的人就多了。

有一天章含之来到了沙洋，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要深入挖掘五一六分子。上面肯定外院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重要据点。有大批危险的成员还埋得很深。显然，章这次手上握有上方宝剑，因为原来的海军宣传队给8341的人替换了，一个叫孙得福的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到这里坐镇，而孙显然得听命于章。在外院，章是个有名的人物，因为她是章士钊的女儿，伟大领袖毛的家庭教师。因为她，外院红旗大队才得到伟大领袖的一句肯定的话，翻了身。

章的一生十分戏剧性，关于她的传说很多，她自己写过书，她前夫也写过书，个人生活上有些事情，恐怕永远说不清。她与乔冠华结婚以后，在外交部一度呼风唤雨，十分活跃。四人帮垮台以后，又挨过批斗。其中是非真相外人很难判断。我估计一些传言多少都是真假假，伴有水分。她也许不像她自己说的那么好，但我觉得也没有理由将她妖魔化。她在北外毕业，留校任教十年，大家对她是了解的。此人长得很讨人喜欢，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天生一张巧嘴，加上因为有特殊背景，见闻特别多，是讲故事的好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她在场，总有一帮人围着她，听她眉飞色舞地神侃。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对她不喜欢，喜欢的现在又不好开口。但我出于完全不上纲的原因，对她仍有感激之情。章对朋友很好，很慷慨。我这种人，对她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我曾多次和其他朋友被她邀请去她家做客，受到她热情招待。有一次，她给我的饭碗也许是家传的艺术品，小巧到我不小心可以一口吞进肚里。我竭力降低速度，饭一粒一粒地扒，但那微型小盏里的几十粒米饭也一下扒尽了。后来我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提出要求，问她是否可以换大几号的正经的饭碗。还有一个人的理由，文革中要不是章让我们这派翻了身，像我这样的“狗崽子”，这次运动恐怕在劫难逃，凶多吉少。总之，作为朋友，我欠她很多。但在政治信念上，我发现我很难认同她后来完全失控的虚荣和政治上的野心以及那种高等华人的生活方式。有朋友说曾经听到我批评她不该投靠江青，而她不服，说她投靠的是毛主席。这事应该发生在江青还不可一世的时候。我是不是说过这句可以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话，我其实根本不记得。不过，我的确认为，对章来说，政治理念上的是非不是她真正懂得和关心的。但她已经卷进了核心的政治漩涡，而她并不具有跳出这个漩涡的清醒头脑和精神力量。这点她一直到生命结束都没有认真的反思。我不想在这里全面评价她的一生。我要回到我们沙洋的生活。

而在沙洋，章的确欠了北外很多人一笔债。通过抓五一六，她整了相当一批教师和学生。现在我们知道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冤案。背后发动这场运动的当然是个大人物，但章在外院是主要的执行者，依靠对象是我们红旗大队的人马，执行的结果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整个干校一片恐怖。我们红旗大队的一些骨干，利用各种变相体罚，逼供诱供，从对立面几个人中先打开缺口，然后迫使他们一咬十，十咬百。牵连所及，五一六分子越审越多，强迫交代的罪行也越来越离奇。我对有些被揭发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教师并无特殊好感，我也相信他们中不少人怀疑周恩来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政治气氛中，也算不上滔天大罪。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那些温而文雅，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教师，会暗藏剪刀，准备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时刺杀周恩来。

文革的可怕在于，所有人都似乎丧失了常识和理智，一个个都疯了。记得文革初期，郑刚在家磨菜刀，对立面的教师居然一本正经地引用毛的话说，“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一个个系内的同事，都坦白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交代的材料一大摞，但这些交待几乎全都对不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当时因为算是站队站对了，本来这场清查运动应该有我的任务。但是我显然被认为是不适合对敌斗争的。我们中审案大将是老梅，我的好朋友。他一向以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作为榜样，因为那位传奇人物，据说和康生一样，有神奇的本领，可以一眼就看出面前的人是个暗藏的敌人。我很尊敬我这位师兄的人品和能力，但我实在不能同意他在这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我们有过几次严肃的争论。我告诉他我看过现有交代材料，根本理不出头绪，明显地都在胡编乱造。我说我怀疑我们是否弄错了。但老梅表现了毫不动摇的信念，他认为，现在是两个阶级的大决战，斗争空前复杂。敌人的伪装也花样百出，其中一个就是尽量把秘密组织扩大，人越多，就越能把所有人都捆绑在一起。他叫我多想想，多调查调查。我于是单独“提审”了王立礼，因为在我最不相信是反革命的教师中，有一个就是她和她丈夫。我基于革命立场，没有透露我对这整个运动的怀疑和对她们夫妻俩的同情，但我反复“开导”王，应该实事求是，“相信党”，说实话。我当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智商，“提审”什么结果都没有。几天

以后一个晚上，老梅对我轻轻耳语，叫我晚上旁听他如何提审另一位女教师，他很有把握地说，种种迹象表明，今晚，这个审查重点要交待实质性问题了。我不想详细叙述当晚审问的经过了。这个审查重点是个绰号叫小书呆的高才生，文革前一年刚毕业留校。凡是对这位细声细气的文弱姑娘有点了解的人，恐怕不会相信她一生杀过鸡。但当天夜里，经过一步步引导，终于让她明白，她应该交代她是如何参与策划谋杀周总理的。步步紧逼的审问进行到夜半时分，老梅给她几分钟休息。他在会场外信心十足地告诉我，回头这位审查对象就要竹筒倒豆子，和盘吐出了。记得我的回答是，马上她就要彻底地胡说八道了。

有意思的是，老梅说我是典型的东郭先生，在我面前，敌人会全部安然逃脱。我反过来说，在他眼里，很多无辜的人也会被他弄成敌人。可笑的是，回头来看，我们两人对对方的意见可能都是对的。但是，我至今仍觉得，我即使做不可救药的东郭先生，也不愿意接受‘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逻辑。顺便说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在我们现代大学英语第一册里，选了一篇一个少年救了一只狼崽，并与他建立了动人友谊的故事作为我们的课文。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这段历史大家都不想再提起了。据说，当时这个案件在全国牵连到的人，有近千万。现在认为这不是冤案的人大概没有多少了，但事情的真相并没有完全清楚，官方也至今没有正式结论。我上述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看到的那些做法，实际上是历史上整人的惯例。根据很多学者和当事人的揭露，从当年镇压 AB 团、延安整风、反胡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到文革中和文革后从古未有的极端，用的都是一套手法，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人道的套路。历史上多少无辜的国人就这样成了冤鬼。不久前薄熙来在重庆的所谓‘唱红打黑’告诉我们，文革的阴魂仍然还在。文革的教训正在危险地被我们遗忘。有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极力企图掩盖历史的血的事实，有些年轻人则天真地认为，那些卑鄙齷齪，残忍疯狂的暴行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民族，如果连这样的历史教训，也能在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民族恐怕的确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我们北外是个两千多人的小单位，整人方式远比其他地方“文明”。文革中活活打死和被迫自杀的就我所知，也不过七个人。当然还有类似从我宿舍顶上五层跳楼而居然未死的和给逼疯的，武斗打伤打残的。但除了在大会堂批斗陈毅、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外，好像也没有特别出格的“革命”行动。但北外人说实在，无论是那个派别，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整，也几乎每个人都整过人。老梅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得势时，他总是主审官，我们倒霉了，他立刻就成为被迫害的主要对象。回头来看，不管哪一派，我们对这十年的疯狂都有不同程度的道义责任，也都是文革这绞肉机里逃生的幸存者。现在是我们每个人指天发誓，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让这类残忍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了。

北外现在每到校庆之类的节日，就要大谈学校的光荣历史，高唱“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指导，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的校歌，宣扬我们是“大使的摇篮”。我们学校当然有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我们至今还没有认真梳理分析我们的历史，没有真正从我们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北外历次运动中含冤而死的，我们都应该给他们下半旗，树碑，为他们郑重悼念，为他们恢复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给他们赔偿损失。北外人的心没有这样认真的洗涤，干过蠢事的人没有真诚的忏悔。我担心这个学校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灵魂。

我怀念投河的吴璞同志，她在捆住自己双手投河的前几天，我还请她在苏州街饭馆吃饭庆祝她的生日。她还偶尔露出微笑回应我的问话，我绝对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她已经下了结束生命的决心。我怀念文革中吓得跳楼的 Margret Turner。今天很多年轻教师每年得到的“陈美洁教学奖”就是这位英国专家用她毕生的积蓄设立的。她是我大学一年级时的老

师，对我们如同慈母。我至今仍珍惜地保留着她和我，杨鑫南三人一起的照片。我祝所有我院在文革中死去的人的冥福，他们中有一个就是被我当年的一位学生活活打死的。我可怜这死者。我同样可怜我的学生。他在我记忆中是一个文静的优等生，他肯定听了列宁的话：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结果，就像当年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在斗争会上一下踩断他爹两根肋骨的薄熙来，他也开始毒打那些所谓‘阶级敌人’，慢慢打上了瘾，最后成了杀人凶手。我同情这位学生，因为他的一生将会背着这个十字架。

回想文革中和其它40多次的政治运动中死去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被愚昧无知的所谓“群众”用千奇百怪的残酷手段折磨而死的。事实证明，对任何人的残忍，都必然会导致对人性的扭曲。它只可能让人恢复兽性，而决不会在残暴中修炼成革命战士。我还要真诚地向已经去世的崔定远、杨岗两位校领导道歉。文革中，我们这一派要打倒他们，而我多次在批斗会上发言批判他们，给他们胡乱上纲。现在看来，大都非常荒唐。尤其是对杨岗。他当年下放到山东老家，结果发现农村中严重的问题。他发现历次运动都按毛的指示，每次只打击5%的敌人，但日积月累，生产队里各类敌人的累计比例已超过多数，以致很多队里，已选不出干部。于是就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报告，反映农村矛盾百出千出万出，希望中央关心此事。他的观点，今天看来完全正确。我当时不该无知地把这些通过正当途径向上级反映看成对社会主义农村的恶毒攻击。

我还希望系里同事，不要忘记我们还曾经有过一位叫吴正国的刚留校的教师，后来从家里拉到沙洋审查，我是负责审查的一个。记得，他每每滔滔不绝，讲他刚刚被江青或张春桥接见的情况。他实际上满口胡说八道，已经明显地神经错乱，可我们中有人还坚持认为他是在装疯卖傻，要继续严审。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后来如何发落？也不知道他后来病情是否有好转？今天又在何处？文革完全毁灭了人性。人与人已经没有了起码的同情心。我对吴正国并不熟悉，但他毕竟是个活人，爹娘把他养大成人不容易，家里肯定有一大批人天天为他提心吊胆。可是我们都变得可怕的冷漠。我参加所谓学习班整人的对象还有梁建玉，蔡绍龙等。几个月前，我突然看到梁的讣告，不禁想到这位马列教员当年挨整的样子。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他说不定还能健康地活下去。我现在带着深深的羞愧回顾北外的文革史，就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共同的耻辱。当时两派你死我活，打得不可开交。一派攻击对方反总理，另一派攻击对方是二月逆流派，反中央文革。一派要打倒原西院干部刘、郝、石，另一派要揪出东院派干部崔、杨。我们的对立面还把外国专家柯鲁克弄进了监狱，揪斗了一批所谓反动权威。其实两派都是被利用操纵的工具，都干过荒唐事，都有不太光彩的动机。两派得势时，手上也都有对方的鲜血。两派的构成的确有些特点，在教育路线，外交路线和对学术权威，外国专家的态度上也有一些差别，但一定要比较，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一个珍惜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跳出当时的门派。并且敢于直面自己灵魂中的邪恶。

□ 来源：北外王立礼的新浪博客

~~~~~

## 【劫后反思】

“启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 林贤光 •

我叫林贤光，今年84岁。1953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建筑系教书，到现在63年了。文革中我和天大的同班同学陶德坚一起发起组织了“清华红教联”，先是由于江青的一句话定性，“红教联”成了“反动组织”，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又成了“516”的清查对象。武斗期间被团派关押在生物馆，以后工宣队搞清队再被隔离，再后



来搞清查“5 1 6”又第三次被关押隔离。在此期间曾被抄家、绑架、殴打、批斗，家中的亲人因此而去世。文革后，我一度再不想提起这些伤心的事情。嗣后受到了一系列的启发才使我敢于正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并把自己的回忆和反思写出来，警示后人，绝对不能让文革这场血淋淋的浩劫再度出现。

最近，有许多文章提到了“启蒙”的重要性。我就是启蒙的受益者。罗素把启蒙定义为：“把人们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资中筠先生也说：现在需要一场“再启蒙”的运动。我深深感到这是非常必要的、极其重要的、极其迫切的。特别是对于文革这场浩劫的反思更是当前最重要的启蒙内容，无法回避，是绕不过去的。

如今，且不说社会上的70后、80后、90后，他们对于文革几乎一无所知，甚至他们说我们那时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进一步竟然有人以为现在的反贪腐正是文革中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体现，从而得出文革是必要的结论。形式上唱红打黑、像章语录、标语口号的出现，隐隐约约地似乎文革的阴魂又将扑面而来。而更加严重的是很多人、不是少数人的思想里还不能摆脱过去的思维方式。几十年的思想灌输使得僵化的思想深入骨髓，这里也包括对于文革浩劫历史的遗忘和无知。要摆脱这种思想桎梏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因此，无论对于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说，启蒙和再启蒙都是十分必要的。

用文革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进行对他人的启蒙和对自己的再启蒙是一个最好的启蒙方式。这不仅对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让他们知道文革的真相，就是对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通过回忆和反思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唤醒良知、深化认识的再启蒙过程。我正是经过许多方面的帮助和启发，才使自己有了一点认识和提高。最早的是看了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此后，陶世龙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前《炎黄春秋》杂志上的许多文章、清华校友网“六四社区”上同学们的诸多论述，直到孙耘、孙怒涛、蒋南峰等同学到我家和我的深刻倾谈，所有这些都使我不断地加深认识。你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

尤其是几位用行动来证实文革错误的事，更加使我认识到那时真是一个一切都已失去常规，疯狂无序的浩劫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率领“4 1 4”战士抄了我的家的“4 1 4”作战部长蒋南峰先生到我的家里登门道歉。团派的保卫部长崔兆喜先生在临去世前，讲出了派人假冒“4 1 4”绑架了我，还打了我一顿，为的是怕我泄露了团派的“机密”。这两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说明人间的良知还在，真诚还在。他们是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以深刻的启蒙。同时也促使了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当然也包括“自我拷问式”的忏悔。

反思不能仅仅限在文革十年，它与文革前的十七年是紧紧联系着的，因此，启蒙的反思应当从整个历史着眼。可惜的是清华和全国一样，至今这些历史档案还不能公诸天下，官方的“史书”又回避了许多内容。有人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我不太同意这种提法。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不能全“大呼隆”地一笔带过，往往是细节告诉我们更深刻的真相。

我只是一介草民，不了解高层的那些复杂的“路线斗争”。但是，仅就我所在的这个清华大学来说，在文革中间就有不少谜团待解。如：

文革十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前两年的历史，也就是红卫兵活跃的那两年的历史。而对于后八年，也就是工（军）宣队统治的八年则语焉不详。我认为这工（军）宣队统治的后八年对清华的破坏，无论从思想、体制、到对物质的破坏都要大于前两年。前两年红卫兵热衷于“上揪”，更热衷于往外打，校内有两派互相牵制，总体上破坏并不是十

分严重。物质上不过拉倒了二校门，火烧了科学馆屋顶。但是，工（军）宣队统治的八年，是持有尚方宝剑来坐镇清华的，领导又是“毛主席身边的两个兵”，说一不二，在这八年里对清华的破坏远非红卫兵打派仗可比。但是，对这八年的历史，不仅反思、批判得不够，就是揭露也很不够。我认为，这后八年的文革史若不补上去就不是完整的文革史。就这一点来说，怒涛的《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和台湾出的《水木风雨：清华文革史》，我觉得都不够。够不上是清华文革的完整历史。

对清华文化的破坏，大家只知道在“8·24”红卫兵拉倒了二校门。大家不太知道的是：工（军）宣队曾经布置任务，计划拆掉清华学堂。那座清末建造的、有那桐题署匾额的清华园里的第一座洋式建筑，现在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物建筑的清华学堂，他们却认为那是封资修的代表，已经布置了如何拆除的方案。如果四人帮再晚揪出来几年，说不定就被拆掉了。刘达校长在他的文章《我与清华》中，特别强调了他把清华学堂这座清华的地标建筑保护下来，显然是有所指的。如今，来清华参观的人成千上万，都要在二校门和清华学堂前面留影，但是，很少人知道这座建筑曾几乎被拆掉，只是随着文革的结束才幸存下来的。

在建筑系，工（军）宣队将上世纪30年代重要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大批档案，送到造纸厂销毁了。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用西方的科学考察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民间团体。梁思成先生、刘敦镇先生、林徽因先生和莫宗江先生都是这个机构的主力。由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营造学社的成员转移到内地，而营造学社的档案无法带走，就寄存在天津的一家外国银行中。1939年天津大水，部分档案曾被水浸泡，但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到抗战胜利后，这批档案由梁先生从天津提出，运回北京，藏在清华学堂的阁楼上。1971年夏天，却被工宣队作为废纸垃圾送往造纸厂销毁。其中包括大批梁先生等几位老先生当年对古建筑的调查测绘手稿，极其珍贵，全都毁掉了。此事我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目前，建筑系资料室仍保存了一部分营造学社的档案，那只是劫后余存的一部分而已。

从1969年到1971年，清华有3000多人，包括教师、职工和家属，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那里本是血吸虫的重灾区，这已经有许多文章揭露了。但是，在那里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了血吸虫病？死了多少人？这件事过了45年了，好像都被遗忘了。据梁光启先生的回忆，大约是死了20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这都有待核实。但至今有关的档案还是被冻结着。在那里，人们的精神和健康都被严重地摧残了。我们土建系的赵若鹏老师是第一批去鲤鱼洲的棒劳动力，在鲤鱼洲能挑52块砖，接近350斤。可是从鲤鱼洲回来以后，病得下不了楼。他在2016年2月去世了。这笔账又找谁去算？

唐少杰先生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是52个人。但是没有计入在鲤鱼洲病死的人，也没有计入文革中因被斗、恐惧、焦虑而造成精神损伤的人。其中有的人在后期仍有自杀的，这也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除此以外对文革的反思不得不联系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其中包括蒋南翔校长统治的十五年。这十几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应当如何评价？怎样认识？从中应当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进行过认真和足够地讨论。现在都说蒋南翔和梅贻琦两位校长是两位教育家，那么，这两位教育家的区别在哪里？他们贯彻的教育路线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也没有弄清楚。“讨论”也就是一种互相的启蒙。

文革以后呢？

郭道晖先生写了一篇他自己参加的关于4000名高级干部在文革后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关文革的经验教训问题。文章发表在前《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的第4期上。之后，就有两位清华的政治课老师出来声讨，兴师问罪，大帽子扣过来，说郭老师是“反党”、“泄露机密”。

我写了一篇《我和清华红教联》，在《历史拒绝遗忘》文集上发表了以后，我也听到了有一些反映，说：林贤光是在为红教联“翻案”。我不知道我要翻什么案。红教联是“反动组织”吗？陈里宁都平反了。红教联是“大杂烩”吗？我在文章里也一位一位地做了解释。我说了：红教联不过是一个在清华文革中只存活了139天的短命的群众组织，而且是犯过无数错误的一个群众组织，还有什么“案”可翻呢？就我们的人来说一位一位地似乎都没有事了，可是对“红教联”这三个字在清华还是谁都不敢沾，臭得很，看来真是要遗臭万年了。

2013年，由于孙耘同学的介绍，我参加了校友网的“六四社区”，从大家的畅所欲言中获益匪浅。但是，这个“社区”去年被关闭了。

只能说“左”的势力仍旧在社会上十分强大，文革的余威仍旧还有很大的市场。这更加证明启蒙的重要和迫切。文革的再次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如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实实在在地大有乌云压城之势，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亲身经历过文革的狂风暴雨的人来说，感到不寒而栗。

启蒙的重要性还在于启发民智。我们不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吗？如果，广大群众在没有充分地得到启发，准确地理解民主和自由的含义的话，即使给了我们民主和自由的大环境，我们也很难去正确地享用它。甚至可能错误地运用民主和自由伤害人民，把历史引向邪路。这点教训我们是有切身体会的。文革初期，我们曾有一段短暂的自由环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以至于自由到了无法无天。群众专政，抄家、关押、私设公堂、甚至打死人不偿命，造成社会的大混乱、大倒退、直至破坏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毁坏了历经战火、保存至今的无数珍贵文物。这样的历史教训不仅我们这些人应当通过回顾历史的“再启蒙”紧紧牢记，更应当“启蒙”我们的子孙万代，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是绝对不能让它重演的。

须知，我们的教训是：

民主必须是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的。

自由必须是有法制约束的前提下进行的。

启蒙除了启发民智之外，还必须要唤醒自己的良知。文革中，破坏了一切，也破坏了我们自己的良知。所以要把我们自己的良知找回来，然后对自己进行痛苦地“拷问”。包括反思、检查和忏悔。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大环境或者别人身上去。这就是一个自我的“再启蒙”。这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我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我将要对自己用寻找到的良知，继续不断地“拷问”自己。启蒙、启蒙、再启蒙，把它当作自己余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来督促和改造自己。也向在座的同学们和一切有良知者学习，提高自己。

以上是我的一孔之见，十分肤浅，请大家、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多加批评指正。

2016-4-22，2016-12-30修改

（作者简介：林贤光，男，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同年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教授。）

#### ◇ 讨论帖选登

▲ 王克斌：林老师说的启蒙至关重要。法国的思想启蒙是西方社会进化的重要软体。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不只是口号，它们有深刻的内涵。中国是农民国家，小农个体，有许多天然弱点。需要长期的教育改变。故而需要一大批知识精英致力于此。

▲ 吴学民：文革对清华乃至全国的祸害之巨与当局压制反思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更凸显了反思及启蒙的紧迫性。

反思包括回忆和思考两个方面。如果思考深刻，那就不但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有启蒙的作用。对文革的反思，我觉得官方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很关键的一步。这说明，反思文革就是要从彻底告别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回归人性。遗憾的是，当局浅尝辄止，阻止了大家深入探讨，其中原因你懂的。人性就是人皆有之，不分东方西方，也就是所谓普世的。

▲ 李仕林：林贤光老师说的“启蒙”，实际上就是反思文革。反思与启蒙虽然有联系，但差别还是很大的。林老师提出，文革前两年的史实已经比较清楚，后八年连史实都不清楚，何谈反思？我赞同林老师对此点的强调。我们这些老六届的人说的反思文革，常常只反思两年，没有深度触及后八年。毛在文革全过程的思想体系，也不是那么准确、完整地予以研究。

▲ 朱永沛：需要有一场全面深入的启蒙教育或运动。

什么是启蒙？简单说就是从一无所知，一窍不通，一点不会而迈向有所知，有所通，有所会的境地。

亟需启蒙的是什么？我以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为重要。

我在校时从来不知道有清华“校训”一说。后来才听说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曾经也在网上看到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桑德尔教授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两难的情景：火车制动失灵，司机唯一可以决定的是继续直行还是拐到支线上去。一边铁轨上有5个人，另一边人少。然后提出问题：司机该如何是好。接着他让正反两方的同学发表各自的观点，互相辩论，并引导辩论的方向和深度，最后却不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看了以后震惊很大：原来上课，教学可以是这样的！

然而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在自然科学的教育方面稍好），也许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如此，简单来说就是：一直被告知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每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和逻辑方式。一旦长大成人并需要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很难说做出的决定到底真正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另一个人（父母、老师、上级等）的想法在自己身上的复制。

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观点想法是自己“原创”的。当然真正自己原创的观点想法也许会和其他人的相同，但一定是经过自己大脑深思熟虑，符合自己价值观和思维逻辑，遇上反对者时是可以辩论一番的。

假如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遇到新事物新现象时不会自己独立思考，问问为什么，而只是根据以前被“告知”的一套说辞照搬，照套，把上面的说法当成自己的想法，那么在主流声音（包括历史教科书，政治学习讨论，报刊电视）已经对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当局的“标准说明和解读”的情况下，面对这样的尚未

启蒙的大众想要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阻力肯定是很大的。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于统治集团，而且来自于社会大众。

统治阶级深谙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而教科书是向学生灌输观念的重要资料来源。日本、台湾分别修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和去中国化都引起大陆官方的担忧。而大陆官方1949年以后早就用上了新版的教科书，尤其是历史书。现在更听说把很多鲁迅的文章从语文书中拿走。目的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要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观点。这与桑德尔教授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后者是提出各种思考问题可能的取向，帮助并让学生学会如何自己做出判断。

在当局严控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话语权，单由个体、小众地开展启蒙教育，成效无法乐观。而政府愿意推动的启蒙教育也许仅局限于：遵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貌，节约用水……。至于期望推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启蒙运动实在不敢奢望。其实任何有独立精神的人若用“常识和逻辑”来看问题，世上很多事情并不复杂。

▲ 陈长坤：林老师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能勇敢地站了出来，将自己在文革中所经历，所参与的事写了下来，我很感动，也很钦佩。林老师所写的两篇文章，即《我和清华“红教联”》及《我参与了北京天地派的斗争》（见《历史拒绝遗忘》），我认为写得很好，很详细，我认为也很真实。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参加了文革的当事人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交待！但是说到现在需要开展对人们的启蒙教育，我却难以苟同。何谓启蒙？按《现代汉语新辞典》的解释：启蒙指传授基础知识或入门知识。我们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缺的是基础知识，还是入门知识？显然不是。我们讲启蒙，谁是启蒙者，谁又是被启蒙者？能说得清吗？有让你进行启蒙的条件吗？显然也没有。中国是有过启蒙的。远的不说，解放后，共产党就通过学校与宣传阵地对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启蒙：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是共产党解放了你们，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一教育，全国人民山呼毛主席万岁。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运动，是三年大饥荒，是文革浩劫。1978年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又进行了一次大启蒙，党也犯错了，毛也犯错了。邓大人拨乱反正，带来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但由于邓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党内的腐败急剧发展，民怨沸腾。当今重启全面改革，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面。难道人们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吗？我觉得不是，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但是不能说，不敢说，这与启蒙没关系。所以我以为当前能做的不是启蒙，而是将历史的真实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的责任。

▲ 李子壮：神学重启蒙，喜欢讲故事。科学重教育，因此讲逻辑；经典好训斥，只得靠灌输。——不论哪种，前题是先知知后知。但到了成年人这里，基本无效。尤其是灌输。灌进去多少，最后会吐出来多少。——因为成年人世界观已经“定型”。——求真固然是精英的追求，务实则是百姓的本能。

▲ 王铁藩：“几十年的思想灌输使得僵化的思想深入骨髓，这里也包括对于文革浩劫历史的遗忘和无知。要摆脱这种思想桎梏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因此，无论对于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说，启蒙和再启蒙都是十分必要的。”林师的话多么深刻及时啊！启蒙的武器是什么？就是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清华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启蒙的起点在哪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我们不是人文理论家，难以博古通今，但我们是文革的实践者。正如林师所说：“用文革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进行对他人的启蒙和对自己的再启蒙是一个最好的启蒙方式。”林师1953年（与蒋校长同年）来到清华。十七年，林师践行了十四年；又实打实地全程投入了文革。因此，林师短短的四千字，就让人领略了清华文革的全貌——现身说法最能感动人。清华建筑系办学较晚，天津大学来清华的几位，堪称清华建筑系的“开国元勋”。他们不仅学养丰厚，思想也极活跃。蒋南翔与刘冰治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基本属此。后有五位被划右派。其中小集团头头曹昌彬与我在同一工地劳动。人聪慧且厚道，成为工地布置会场，翻绘加工件大样的“大拿”。这本

当是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却被淹没在建筑风韵极其独特而丰富的清华园里，怎么能不令人扼腕！行笔至此我不禁老泪纵横……世人多么需要林师这样的反思，这也是最感人的启蒙啊！

▲ 陆元吉：我理解的启蒙首先是常识的回归。这是初级的，但也是最重要的。

▲ 陈中平：林老师提出再次启蒙的问题，很有意义。

反思文革是实现第二次现代启蒙（第一次是清末民初）的必由之路。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进行反思呢？中国人思想之现状，可以分为若干层次。粗略地说，大致如下：

1、完全按照毛式思维塑造成型，而且坚持到底的，恐怕不多；2、以自利为目标，没有清晰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不自觉地部分接受毛式思维，通常随大流，这些人是多数；3、有自己一些看法，但不愿意思考，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明哲保身；4、思考有一定深度，有时在口头或微博上发点牢骚，一般不愿写作与发表；5、能深入思考，笔耕成文，并愿意在适当范围交流。

参与我们研讨的，应该属于最后一种。能够深入思考和自我与互相启蒙的，的确只是“小众”。恐怕连千分之一（全国就得上百万）都不到。

如果说这些人属于“先知先觉”的范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先知”），我觉得并不算过分。

这样的自我与互相启蒙，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的进步。但是，这样的启蒙要吸引大众，并且逐步发展成“启蒙运动”，必须首先具备百家争鸣的气候和土壤。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百家争鸣（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都是礼崩乐坏，内忧外患的乱世。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并非乱世，却依然没有自由表达的条件与环境，实现百家争鸣。

要想获得百家争鸣进而开展启蒙运动的机遇，必须有上下的呼应与互动。

领导者具有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的前瞻意识。能够集思广益进行政治改革和实现国家转型，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付出的代价最小，获益最大。

或许这仅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吗？

▲ 孙毓星：陈学长，照您所言，很难。

中华历史上治世少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与清末民初可算准乱世，不同于改朝换代时的大动乱，而是群雄割据争霸天下重用人才的时代。

这真是历史的悖论，中华民族的宿命。

▲ 吴学民

其实新启蒙一直在进行。这要得益于互联网。虽然有诸多管制，但启蒙的思想一直在传播和扩散。所以才会有“七不讲”等倒行逆施。

▲ 杜钧福

很拥护林学长的文章。孙怒涛筹备编文集时我就想到，工宣队阶段恐怕欠缺。此外，很少文章涉及教工阶层，因为你们是学生，很快走了，缺了这部分，清华校史不完备。

这事和启蒙什么关系？传统文革定性将坏事归到四人帮，下面是造反派。启蒙就是要把这些论断归零，从第一原理出发，从头开始。

什么是第一原理？有人说是普世价值。其实我看，普通人的常识就行。

官方文革定性是从政治大局出发，可以理解。但我们研究历史出发点不同，必须摆脱这一定性影响。

进一步摆脱好人 / 坏人二元论历史观，摆脱阴谋论，不要局限上层内斗，考虑社会背景。

▲ 沈昆：林老师提出再次启蒙的问题，我的看法如下：

我们这里说的启蒙，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下狭义的文化教育启蒙，而是说全社会意义下广义的民族文化启蒙，这一启蒙的目的在于改变我们落后的民族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接纳和发展当代先进的文化，以便进入当代世界的先进文明。对中国而言，启蒙的重点并非科学技术落后的问题。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重点在于破除几千年来封建迷信，包括对皇权的迷信与屈从以及对封建礼教的迷信和盲从，这当然与科学技术的落后有关。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运动，虽然在涉及自然科学的领域较有成效，在社会学领域则效果不彰。

中国第一次启蒙恰值苏俄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列主义，以至一部分中国社会精英接纳了马列主义为真理，特别是1949年共产革命的成功更加巩固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地位，因此在中共当局专制体制下领导人进入了新的迷信，也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理”迷信，以及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迷信。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也正是从文革开始，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开始破除上述新迷信，首先是从破除对于1957年反右时建立的对基层至中高层的中共党组织的迷信开始，直至1970年代开始质疑马列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等，这些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二次启蒙的起点。

当然，中国这第二次启蒙至今没有完成，而且进行得很不顺利。这当然主要归“功”于还乡团式的终结文革，文革反思被中断、切割而未得到延伸，伪真理依然被奉为神明而信仰，“畏光症”仍然自诩为伟光正的天命神权。

▲ 陈中平：沈昆，你说的中国现代第一次启蒙的见解很精辟，完全同意。而第二次启蒙从文革开始，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我认为，文革根本不是什么“启蒙”，反而是“增昧”的顶峰。

我认为，一场影响广泛深远的启蒙运动，需要以百家争鸣作为前提。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否达到启蒙的效果，我没有深入考虑，不敢妄断。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现代第一次启蒙，都是以百家争鸣为基础的。

毛为了发动文革，起初给“奉旨造反”者恩赐了“四大”自由，以达到冲垮刘邓的目的，同时也放开了武斗行凶的闸门。

但他只允许一家独放，只要出了格，违背了圣意，四大自由随时可以收回去，随即大棒镇压。如此情形，哪里还谈得上启蒙？

文革中独立思考，离经叛道的思想，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有的迂回曲折，在地下潜行，才得以硕果仅存。

文革结束后的“苏醒期”，前后不过三年，影响有限。此后的跌宕起伏，就不多说了。

迄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所谓第二次启蒙，并没有形成局面。充其量只能算是“酝酿期”或“前奏”，甚至可能重新陷入低谷。

社会发展是以加速度前进的，不能拿古代的慢节奏来衡量当代。如今半个世纪可不算短了。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现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仍未出现，更不可能以文革作为它的起点。

▲ 启正：沈昆、陈中平，我对林老师所用的启蒙一词的理解比较简单，包含的意思一是自身的觉醒，二是唤醒他人。文革无疑是使中国跌入空前愚昧的运动。由于其特别地荒谬，特别地反动，造成特别大的灾难，被运动的中国人中有人逐渐地觉醒，并且人数从极少数逐渐增加，在个人思考和小范围议论中对“主义”、“思想”尤其是对“伟大领袖”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就是与文革发动者的愿望相反的觉醒。这些人有没有启蒙他人？口头言传是有的，但是范围很小。文革后先觉悟的人努力向他人表达他们的觉悟，觉悟的人比文革前增加

了很多。在这些意义上称文革为第二次启蒙也未尝不可。只是受到当局尽可能的打压，挫折屡屡，进步缓慢，今后仍路漫漫其修远，但我们责无旁贷。

▲ 林贤光：看了两天大家的讨论，收益匪浅，许多提出的问题都促使我再去深思。

有几点思考：

1，我这里提到的启蒙，是指的是思想上从蒙昧、不成熟到觉悟、解脱，从而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并不是指知识的提高。

2，我认为，清华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头脑清醒的。目前，多数人是非也是清楚的。只不过现在不想讲，或者，敢讲，但绝不落下黑纸白字。也许更多的人还在观望。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多次站队，站错就是大事，所以十分小心。我觉得要理解他们，也还要通过启蒙使他们站出来。他们要说的话会比我深刻的多。

3，我只是觉得我的认识还是属于刚刚被启蒙的程度。独立思考还很差，旧影响还是很深很深，渴望得到多方面的启发。

（原编者注：在本文讨论中，除了重点讨论了启蒙等话题外，还议论了蒋南翔的功过，清华师生在江西鲤鱼洲农场的苦难等话题。）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